

文化诗学

童庆炳
著

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
研究中心学术成果【文化诗学文丛】

主 编 童庆炳 执行主编 姚爱斌

文化诗学

童庆炳

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
研究中心学术成果【文化诗学文丛】

主 编 童庆炳 执行主编 姚爱斌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 / 童庆炳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561-0674-5

I. ①文… II. ①童… III. ①诗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1055号

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

编 著 者 童庆炳

责任编辑 龙昌黄

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674-5

定 价 49.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文化诗学文丛”总序

童庆炳

中国文学理论界的“文化诗学”是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来的，它所针对的是从西方文学研究界输入的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分隔。这种分隔给文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要么是单纯关注文本本身，就文本解释文本，把文学研究与历史现实切割开来；要么是不顾及文本语言自身的实际，除了政治还是政治，把文学研究一味政治化、社会化。文学是什么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它又不止于语言；文学作为艺术是审美，但又不止于审美；文学是文化组成部分，但又不止于文化的意涵。文学可以说是由语言、审美和文化三者交融而成的一种精神活动，因此，仅仅从语言、审美或文化的某一单一角度，都不可能阐释文学的复杂关系和丰富内涵。这样，作为教育部百所文科重点基地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为了推动和深化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了“文化诗学”这一研究方法。

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充分考虑到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整体性和平衡性，其中包含着这样几个要点：审美的检验、文化的底蕴和文本的细读。

审美的检验。既然我们研究的是文学，那么就不能不检验我们研究的文学是否具有文学性。对我们而言，文学性主要是指文学作品的审美

特性。诗必须首先是诗，而不是别的什么，我们才会去研究它。文学必须首先是文学，具有审美性，有情感的脉动，更具体地说就是要有生命的气息，要有生活的独特情调，有可感可触的氛围，有音乐般的节奏韵律，有色彩斑斓的迷人颜色，才能娱人耳目，畅人胸怀，动人心魄。这样，我们才会关注它。如果文学缺少这些审美的品质，那么就不值得我们再更多地去谈论它和研究它了。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出于对汉代辞赋一味敷陈景物而没有情感的投入这种不良倾向的不满，提出了“睹物兴情”和“物以情观”这两个命题。“睹物兴情”是说作者要从万事万物的生存中去寻找感发情感的契机；“物以情观”是说创作中对所写的事物要进行情感的评价，使事物处于情感的笼罩之中，展现出审美的风姿。作家是这样，研究文学的批评家也应该是这样。只有做到“睹物兴情”与“物以情观”，创作者和批评家才能进入作品的审美境界，体会并揭示作品的审美意味。

文化的底蕴。具体地说，优秀的文学是不可能脱离现实和历史的，它是现实生活或历史生活的再现和升华，因此它的人物、情节、故事、场景、细节和言语等，总是一定的现实或历史语境的产物，必须放回到现实或历史的语境中去把握。就文本解释文本，是很难解释出深刻的文化意味来的。我们的古人从孟子开始就提出“知人论世”的解释学思想。这种思想绵延了两千多年。到了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对当时的学风不满，对长期的“经”“史”分隔不满，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其后，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虽然学术界对于“六经皆史”有争议，但章学诚的论述的整体

个意思是清楚的，即便是讲“天人性命”这些大道理，也要“切于人事”。这里所说的“人事”，在我看来就相当于历史语境了。章学诚实际上主张把经学放回到历史中去考察、研究，这是很明智的。

杜甫有一句大家都很欣赏的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它的好处不仅在词语对偶的工整上，也不仅在老年杜甫感受的真切上，更在于它与杜甫晚年的生活语境密切相关。杜甫自大历三年（768年）从夔州出峡，寻找他的弟弟和朋友，始终没有结果。在去世（大历五年，770年）前的近两年时间里，他贫病交加，多种疾病缠身，风湿病、偏瘫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病折磨他，右臂偏枯了，连耳朵也聋了。而且，这段时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寄身在一艘小船上，在长江、湘江和洞庭湖一带漂泊。他想念亲朋，想有个依靠，却始终未能如愿。所以他登上岳阳楼时（768年），“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的诗句脱口而出，也就可以理解了。从这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我们获得了对诗句意味的更深入的体会。

杜甫为什么在贫病交加的极度困难之时，会更感到“亲朋”的可贵呢？这就与中国长期农耕文明所形成的儒家文化思想密切相关。儒家讲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条是人生的大道，称为“五达道”。杜甫晚年出峡，想投靠自己的兄弟，是儒家的常情常理。从杜甫的诗中，我们知道杜甫有名可考的弟弟有杜颖、杜观、杜丰和杜占。杜甫晚年出峡，就是因为收到了在江陵的杜观的信，劝他出峡，才做出决定的。但杜甫出峡后，并没有找到这几个弟弟。虽见到了一些以前认识的朋友，但都无法更多地帮助他。另外，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是讲杜甫虽在老病之中，却仍关心着北方的战事（是年八月，吐蕃寇灵武等地，京师戒严。九月，唐军破吐蕃，京师解严）。从“亲朋无一字，老

病有孤舟”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儒家文化的“长幼”“友朋”“君臣”这些关系的意涵。虽然西方文化中也有这些关系，但从来不像中华文化如此重视这些关系。

总之，在具体的现实或历史语境中阐释文本，揭示出文化的意涵来，是文化诗学的一个要点。

文本的细读。文本细读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功夫，文化诗学主张通过文本细读来揭示作品的审美品质和文化意涵。文本的细读，除了要吸收中国古代诗歌、小说评点和西方新批评的优长外，特别要注意文本中“症候性”的语言、结构、细节、场面、人物行为等。“症候性阅读法”是阿尔都塞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提出来的。他可能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受到启发，认为作者文章的真正意思可能隐藏在字里行间，而不完全在字面上。所以他主张在阅读中要把所读文章的一切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使它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这样，他就特别看重文章中断裂、疏漏、空白和缺失等症候，力图揭示这些“症候”来获得文章的真正意义。后来，这种阅读法被借用到文学阅读中。人们认为任何优秀的作品都会有自身独有的症候性的东西，如反常、异常、悖谬、含混、重复的语言、结构、细节、场面、人物行为等，那么批评家就可以通过对这些症候性的细读和分析，来揭示出作品的真正的意味，甚至是那些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等。鲁迅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有“症候性”的东西。如《狂人日记》的“狂人”把周围一切无关他的事情，都加以联想，最终都归结到人们合谋，要把他吃掉，连他的大哥也是合谋的“吃人”者。主人公的这种非正常的悖谬的行为举止，都具有“症候性”，加以细读，即可发现鲁迅这篇小说揭露了封建社会礼教的吃人的本质。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也是一个反常的细节，也具有症候性。《阿Q正传》中的“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大团圆”等都具

有症候性，通过对这些症候性细节、场景、人物行为的细读与分析，足以揭示出小说的深刻含义。

把文学作品看成一个整体，在检视作品的审美品质的同时，通过把文本放置在一定历史语境中去细读，揭示出作品的真正意义和文化精神，这就是文化诗学研究文学的基本途径。这个方法对文学理论研究同样适用。所不同的仅仅是研究的文学文本变成为文学理论文本。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文化诗学是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中的。今天的中国现实是，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国家实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也大为提高，但现实中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衡现象，如贫富失衡，城市发展与农村滞后失衡，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失衡，收入提高与道德滑坡失衡，东部发展与西部落后失衡，生产数量与产品质量失衡……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不可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但如同前面所说，它的出现是要解决文学研究中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割裂，它的运用就是要培养人的全面的有深度的思维方式。因此，文化诗学的提出，高扬的是平衡的精神，实际上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向现实发出一个吁求：应从严重失衡的状态回归到相对平衡的状态。

本丛书大部分是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近年来的博士论文，这些博士论文的题目不同，选材不同，内容不同，但在文化诗学方法的自觉运用这一点上互相靠拢，并取得了各具特色的成果。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称之为“文化诗学文丛”的缘故。

我们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他们的学术眼光落在“文化诗学”上面，让我们感到欣慰；对他们为此付出的种种努力和辛苦工作，也深致谢意！

2012年1月4日

目 录

第一辑 文化诗学的理论思考_001

- 文化诗学是可能的 /003
- 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 /020
- 文学理论教学的双向拓展 /031
- 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 /038
- 再谈文化诗学 /045
- 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 /048
- 文艺学边界三题 /052
- 从文本中来到文化中去 /063
 -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 /067
 - 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人口 /071
 - “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 /084
- 文化诗学——文学理论的新格局 /096
- 文化诗学：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结合 /104
- 冲破文学理论的自闭状态 /116

当前文学理论发展新趋势 /124

文化诗学结构：中心、基本点、呼吁 /139

第二辑 文化诗学的初步实践 _157

寻找文学理想的灯火 /159

《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 /172

中西文学观念差别论 /200

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五向度 /232

后 记 _272

第一辑

文化诗学的理论思考

文化诗学是可能的^①

一、文化诗学作为外部研究的意义

当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期，韦勒克和沃伦的具有新批评学术色彩的《文学理论》被刚刚打开门窗的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奉为西方现代文论圭臬的时候，当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时候，才恍然明白我们过去所熟悉的认识论的文论、政治论的文论，都不过是“外部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已。我们急切地想了解“内部研究”，追寻“文学本体”，于是揭示文学语言的奥秘，研究小说修辞等，一时成为学术时髦。差不多 20 年的时间过去了，西方文学批评的潮流又变成了解构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女性主义文论、文化批评文论。西方的文论风向又转向“外部研究”，似乎这些“外部研究”才是当下最时髦、最先锋、最前沿、最值得追寻的东西。中国文论 20 年的风风雨雨，终于使我们的头脑逐渐“成熟”起来，认识到文学理论总是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游动，因此无论是“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文学的版图无限辽阔。对于文学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层次性，中西

^① 本文原载于《海汉文刊》1999 期第 5 期。其中主要内容曾以《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为题发表于《东南学术》1999 年第 5 期，发表时内容有所删减。

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

文论都有充分的认识。中国古代诗学提出了诗歌层次论：言—象—意—道。英伽登提出了文学四层次论：语音层，意义层，图式化外观层（作品所展现的人物、事件、背景等），意向性状态中的“世界”层（读者接受中的世界），有时他还提出作品的形而上性质层。艾布拉姆斯提出了“文学四要素”所构成的活动理论。斯托洛维奇描画了主体、客体、心理、社会的复杂的审美结构图。伯克提出了主体、活动、背景、载体和目的五因素的文学“五重结构”。总之，文学作为人的精神活动具有无比辽阔的空间这一点，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我们终于理解文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各种视角和方法各有其特点，“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各有其妙处。它们不过是同一房子的不同窗户，打开任何一扇窗户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觉得当前的文学理论可以双向拓展。一方面继续向微观的方面拓展，文学文体学、文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文学技巧学、文学修辞学、小说叙事学等，仍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又可以向宏观的方面展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政治学、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教育学交叉研究等，也都是可以继续开拓的领域。今天我想着重提出来讨论的是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研究。我想给它一个更美丽的词，这就是“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视界是可能的，因为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样式和文化活动。人类有多种文化样式和活动，文学活动正是其中一种古老的、世代相传的文化活动。文学的文化属性是非常明显的。它从来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的，总是在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互动中存在和发展的。文学中处处渗透着文化的因子。文化中也活跃着文学的诗情画意。因此，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和研究文学，是文学自己的文化身份所给定的，不是我们硬加给它的。

从文化视角中来考察和研究文学，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这个视角的意义在于，它不是从文学的微观视角来考察和研究文学，而是从宏观的文化视角来考察和研究文学；不是从单一的学科来考察文学，而是从跨学科的视角来考察文学。杜甫的《望岳》写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文化诗学就是从文化这个“绝顶”上来瞭望文学，文学的“众山”都会被纳入它的视野中。对同一个对象的观察，不同的视野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文化诗学是企图将几个“窗口”所看到的景物实现一种融合，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文学。所以我们所说的文化诗学，就不是固定在一个视角、一个学科之内的研究，它基本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所以它的洞见也是多元的，它的批评话语自然也就具有包容性。

文化诗学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那时的研究就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而研究的成果就是文化诗学了。我认为像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和荀子的“美善相乐”说等，都是最早的文化诗学。今天，我们在对“内部研究”“神往”了一阵之后，突然又对这种看似无边无际的文化诗学重新发生兴趣，我想是时代使然。我们生活于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了，可另一方面则是人文精神的失落：无私奉献与贪赃枉法并存，崇高牺牲与腐败堕落并存，极度贫穷与无比富有并存，劳动热情与下岗失业并存，希望与失望并存……我们关注这些令人焦虑的现实。这样人们在接受文学之时，多数人并不十分关心那精细的技巧，而更多地关注文学是不是喊出了我们时代千万人的心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当下的文学无疑在语言技巧上比新时期开始时的所谓“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热爱当下文学、阅读当下文学的人却少了很多。

这里也许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一部分作家的作品过分热衷于玩弄语言技巧，而作品本身缺乏激动人心或震撼人心的时代的、人文的内容。所以文化诗学在这个时候被部分学者所关注，是顺应时代所呼唤的文学潮流的。

二、文化概念及文学的文化意义

我们说文学是一种文化样式，那么首先要追问的是：文化是什么？文化这个词大家都是熟悉的，但要把它说清楚不是容易的事情。这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说起。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一般都认为有“体质”和“灵魂”两项。人与人之间体质的差别，现在已经可以用人类体质学的科学检测做出准确的说明。但是若要说明人与人之间“灵魂”上的差别，就关系到文化的差别了。假设有一对双胞胎兄弟，在其出生之初，一切都相似到极点，因为某种原因，出生后分养在中国和美国，那么长大后，这对同胞兄弟虽然在“体形”上还十分相似，但“灵魂”一定有了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们学习了不同的语言，养成了不同的习惯，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性格，学会了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喜欢不同的艺术趣味，崇拜不同的信仰，等等，这种差别就属于文化的差别了。所以文化是与形成人的不同“灵魂”的社会传承密切相关的。

但是究竟怎样来界说文化，目前的意见就异常分歧，据说对文化的界说多达 160 多种。不过较重要的有广义、狭义和符号义三种：

广义的文化概念是很多人主张的。英国 19 世纪人类学家泰勒的文化定义是广义的。他在《原始文化》（1871 年）一书中说：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

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①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最为流行。在西方，文化开始于拉丁文“*Cultuia*”及英文“Culture”，文化原是“耕作”的意思。通过“耕作”，人由动物变成了人。通过不同的“耕作”，人变成了具有不同“灵魂”的人。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也是从广义的视角来界说文化的，他说：

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我们亦将见，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化的一部分，实是无法了解的；一切对于人类活动，人类团集，及人类思想和信仰的个别专门研究，必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相衔接，而且得到相互的助益。^②

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界说与泰勒的界说是一致的。马林诺夫斯基在同一部书中还详细说明了“文化的各方面”：甲，物质设备；乙，精神方面的文化；丙，语言；丁，社会组织。各国多数学者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的。中国学者对文化的界说也多偏于这种广义的界说，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庞朴先生认为：

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作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它包含着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如果把

①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②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页。